

# 抗戰時期香港方面暨馮平山圖書館 參與國立中央圖書館搶救我國 東南淪陷區善本古籍初探

盧錦堂

## 摘要

為保存國家圖書文獻、闡揚傳統學術文化，國立中央圖書館（即今國家圖書館的前身）在籌備之初，即已重視收集古本圖書，惟最具規模、最富意義的，要算是抗戰期間聯絡有識之士於滬、港兩地蒐購善本古籍，經由政府與民間的合作，終讓許多珍貴圖書文獻不致淪入異域。此一堪稱上世紀有關珍籍蒐藏的盛事，前雖不乏學者論及，但多以上海的「文獻保存同志會」為敘述重點，而對香港方面協助善本的蒐購以及在滬善本的轉運，尤其是馮平山圖書館暫代保存這批善本的經過，描寫較為簡略，因即根據國立中央圖書館大陸時期舊檔案，復參考其他著述，撰就拙文以請益於方家。

## 一、前言—國家典籍的維護與「文獻保存同志會」的成立

古籍文獻蘊含先聖昔賢的心血結晶，而其中善本更是國家瑰寶，理應慎重保存並妥為整理，以便推廣利用，繫中華文化於不墜。翻閱有關記載，歷朝歷代多

關鍵詞 (Keywords)：國立中央圖書館；馮平山圖書館；古籍；抗戰時期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Fung Ping Shan Library; Ancient Book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盧錦堂：漢學研究中心資料組組長；E-mail: lkt@msg.ncl.edu.tw

致力於圖書的蒐集與典藏，雖然如隋牛弘有五厄之說，明胡應麟又有十厄之論，典藏散亂毀損在所難免，至若遭逢兵燹，尤讓人扼腕，但仍不乏收拾殘餘的舉動，足證國家文獻很受重視。遠者姑且略過，就近者來說，抗戰期間，國立中央圖書館秘密蒐購東南淪陷區善本古籍一事，誠有激起共鳴，發人深省的地方，我輩可引為借鑑。

其實早在 1912 年，民國成立之初，教育部即多次在臨時政府公報上刊登收買古籍的廣告，正為籌設中央圖書館作準備。<sup>[1]</sup> 直至 1928 年 5 月，大學院第一次全國教育會議通過籌備中央圖書館案，決議該館設於首都，其中提及「一切公有之古本圖書，於可能範圍內，收集之於中央圖書館」。<sup>[2]</sup> 後來，教育部派蔣復璁為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委員，並旋即赴北平督運舊教育部保管處所藏重要圖書及檔案；其中，圖書 46,000 餘冊，撥歸該館以為基礎，而可稱為善本者僅明永樂五年（1407）內府刊本《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一部（見書影三）。接著，奉令接收南京國學書局（即江南官書局，初名金陵書局）。此外，因籌備初期，經費支絀<sup>[3]</sup>，對於珍槧名鈔，只在可能範圍內設法購藏，為數不多。最大規模，也是最富意義的蒐購行動，發生在 1940 年年初至 1941 年年底，時抗日戰事正酣；該次行動，與其稱為「蒐購」，不如視為「搶救」，對象是東南淪陷區的善本古籍。

江南一帶原有不少藏書世家，典藏既豐，珍本尤足稱道；抗戰期間，他們有為生活所迫的，不得已出售先人遺籍。當時，上海幾位有識之士深恐此等國家重要文化財，「如果全部落入美國人和日本人手裡去，將來總有一天，研究中國古文學的人，也要到外國去留學」<sup>[4]</sup>，於是鄭振鐸起草，在 1939 年底及 1940 年 1 月 5 日先後聯名函電教育部及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促以政府力量搶救這些善本古籍；1940 年 1 月 10 日，鄭振鐸獲睹重慶方面的兩份回電。<sup>[5]</sup> 而國立

[1] 〈館史史料選輯〉，《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 16：1（1983.4），頁 57。

[2] 同註 1。

[3] 1933 年 4 月 4 日經行政院第九十五次會議通過，由交通部按月撥助 2,000 元，又自 1933 年度起，核定歲入概算數 48,000 元，計分俸給費 25,920 元、辦公費 7,800 元、購置費 12,720 元、特別費 1,560 元。以上參見林清芬，〈國立中央圖書館之初創與在抗戰期間的文化貢獻〉，《中華民國史專題第三屆討論會論文集》（臺北：國史館，1996.3），頁 853-855。

[4] 劉哲民，〈前言〉，《搶救祖國文獻的珍貴記錄—鄭振鐸先生書信集》（上海：學林出版社，1992.8），頁 3-4。

[5] 陳福康，《鄭振鐸傳》（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4.8），頁 411。

中央圖書館籌備處蔣復璁主任亦早奉令負責聯絡有關事宜，於元旦從重慶動身<sup>[6]</sup>，9日首先抵達香港，離港後化名「蔣明叔」潛赴上海，14日到達，在該地共停留九天。<sup>[7]</sup>

上海自「八一三」淞滬抗戰後，被日軍強佔，租界即成為「孤島」。蔣復璁冒險到「孤島」一行，經與有關人士商議後，決定在上海組成「文獻保存同志會」，用該會名義對外活動，以避敵偽耳目，並訂有辦事細則十條。<sup>[8]</sup>同志會主要成員大抵包括當初聯名函電教育部及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的張元濟（商務印書館董事長。雖因年事已高，聲明不與於辦事之列，但在具體工作上仍曾出力）、張壽鏞（光華大學校長。負責版本及價格的審定）、何炳松（暨南大學校長。負責經費的收付）、鄭振鐸（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兼圖書館館長。負責與書肆或藏書家接洽，以及圖書的編目、保管）、張鳳舉（版本收藏家）五人。此外，在香港方面有葉恭綽（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董事），負責該地圖書文獻的蒐購，並主持由滬寄港精品的轉運事宜；又，故宮博物院古物館館長徐森玉（名鴻寶，以字行）後亦受教育部委派赴上海協助鑑定版本及點收工作；再加上坐鎮重慶的蔣復璁，共同為這次秘密蒐購淪陷區善本古籍的行動貢獻莫大心力。<sup>[9]</sup>

結果，江南各大藏書家如吳興張氏適園、劉氏嘉業堂、江寧鄧氏群碧樓、嘉興沈氏海日樓、廬江劉氏遠碧樓及順德鄧氏風雨樓、李氏泰華樓等舊藏珍籍，都被購得；其他久負盛名如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吳縣潘氏滂喜齋、聊城楊氏海源閣等所散出圖書，亦網羅不少。但是，美、日諸國覬覦我國重要典籍多時，此刻正想趁機搶購，而北平、上海兩地書肆更推波助瀾，競出高價，同志會所遇重重

<sup>[6]</sup> 1933年4月8日，教育部派蔣復璁為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處主任；21日，籌備處在南京沙塘園7號開始辦公（後以此日為館慶日）。1936年，遷入成賢街48號新購館舍，開放閱覽。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起，11月，籌備處奉令西遷；1938年2月，抵達重慶。1940年8月1日，國立中央圖書館正式成立，蔣復璁為首任館長。

<sup>[7]</sup> 蘇精，〈附錄：抗戰時秘密搜購淪陷區古籍始末〉，《近代藏書三十家》（臺北：傳記文學雜誌社，1983.9），頁225。

<sup>[8]</sup> 「文獻保存同志會」辦事細則，見註1，頁77。

<sup>[9]</sup> 以上參見註4，頁4；註7，頁226-227。此外，有關「文獻保存同志會」的篇章，主要尚有：沈津，〈鄭振鐸和「文獻保存同志會」〉，《國家圖書館館刊》，86年1期（1997.6），頁95-115；又，林清芬，〈國立中央圖書館與「文獻保存同志會」〉，《國家圖書館館刊》，87年1期（1998.6），頁1-22。再者，蔣復璁，《珍帚齋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9）中有多篇論文提及抗戰期間國立中央圖書館保存善本古籍的事情。

困難，可想而知，劉氏嘉業堂藏書的購得，便是一個絕佳例子。<sup>[10]</sup> 如此艱苦蒐集，直至太平洋戰事爆發後，有見於上海局勢更壞，租界亦將不保，以致行動不得不暫停。為期雖不到兩年，卻適時購置善本古籍 4,864 部，48,000 餘冊<sup>[11]</sup>，成果可謂豐碩。1941 年 3 月 19 日，上海文獻保存同志會致蔣復璁函，其中即提及：「曾約略加以估計：如能獲得劉貨（指劉氏嘉業堂藏書），則全部精品，可有 3,500 種左右；可抵得過北平圖書館之四冊善本目矣。所不及者，惟宋元本及明代方志部分耳。其他經、子部分，大足並美，史（除方志外）、集二部，尤有過之，無不及。誠堪自慰也！」<sup>[12]</sup> 後來，劉哲民亦曾說過當時北平圖書館編有館藏善本圖書目錄 4 冊，僅載善本 3,900 種，同志會諸人忘我捨身地工作兩年，所購善本圖書差不多相當於北圖原藏善本之數，成績非常可觀。<sup>[13]</sup> 此等珍貴國家文化財既得來不易，則在戰亂中如何轉運至後方妥為保存，值得關注。前面提到除上海之外，在香港亦有葉恭綽協助蒐購珍貴圖書文獻，而馮平山圖書館（見圖一與圖二）在暫時存放自滬運港的善本古籍這方面更出了許多力，此即下文所要述及的兩個重點。

## 二、香港方面有關善本蒐購與在滬善本轉運的工作

如上文所說，蔣復璁在奉令赴上海與張元濟等人商議蒐購散出該地的善本書前，先到香港。他抵達香港後，與管理中庚庚款董事會董事葉恭綽面商，暫定全部購書經費為 40 萬元<sup>[14]</sup>，其中三分之二用於上海，三分之一用於香港，以便兩地所聚珍貴圖書文獻可同時羅致；並由葉氏負責香港方面蒐購事宜。<sup>[15]</sup>

說到在香港購得的書籍，就筆者個人所見國立中央圖書館大陸時期舊檔案，其中有「香港購書目錄」十紙，約 341 種，未詳是否尚不止於此。姑且針對這十紙目錄作說明，主要包括順德李文田收藏的元、明版書，如《輟耕錄》、《辯惑

<sup>[10]</sup> 參見上海文獻保存同志會第四號和第八號工作報告書，刊於《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 16：1（1983.4），頁 82-83、91-94。

<sup>[11]</sup> 同註 7，頁 235-236。

<sup>[12]</sup> 同註 1，頁 88。

<sup>[13]</sup> 同註 4，頁 4-5。

<sup>[14]</sup> 後來除最初暫定的 40 萬元外，還有第二筆 80 萬元、第三筆 70 萬元，見註 7，頁 231-232。

<sup>[15]</sup> 1940 年 2 月 27 日蔣復璁報告赴港滬兩地布置搜購古籍簽呈，同註 1，頁 73。

續編》、《古賦辨體》、《文公先生經世大訓》、《文府滑稽》等 20 種，以及所批校如《西域水道記》、《東埔寨以北探路記》、《龍沙紀略》、《黑龍江外紀》、《近光集》、《契丹官儀》、《華夷譯語》、《東國史略》、《近言》、《不得已》、《長沙藥解》、《金匱玉衡經》、《勾股六術》、《算學啓蒙》、《說文聲訂》諸書；莫氏五十萬卷樓所藏，如元刊本《陳子昂集》，及舊鈔本《太白陰經》、《東莊詩鈔》、《史記法語》、《寇忠愍詩集》、《續幽怪錄》、《玉井樵唱集》、《野處類稿》等；黃氏碧琅玕館所藏，如清梁松年《心遠論餘》手稿 143 冊（查現藏作 144 冊）、清王敬亭編《遼金文存》稿本 12 冊（今以爲鈔本）、明刊《感寓集》（今作清乾嘉間覆明萬曆四十六年刊本）、明刊《鶴汀集》（今作清乾嘉間覆明萬曆間刊本）、清知聖道齋舊鈔本清葛萬里撰《別號錄》、舊鈔本《方齋存稿》（四庫底本）等；徐氏南州書樓所藏，如明嘉靖刊本《盧溪先生集》、舊鈔本《靖康要錄》（向無刊本）、舊鈔本《高峯先生文集》（亦久無刊本）、明刊本《餘冬序錄》、《漢碑徵經全稿》、精寫稿本《延碧堂詩餘類選》、鈔本《夷白齋稿》、《詹鐵牛集》（禁書，未刊）、明嘉靖本《前後漢紀》。此外，尚有宋版《儀禮》、《周易》等 5 冊（天祿琳琅散出）、宋趙善譽《東南進取輿地通（原作「圖」，誤）鑑》；元版《詩宿》（今作明萬曆卅六年長山劉氏原刊本）、《古樂府》（今未見臺北館藏）、《禮記句解》、《橫渠張子鈔釋》（今未見臺北館藏）；《永樂大典》戲字及職字；清代禁書《蒼露草》、《始青閣集》、《陸文定公集》、《沈懋孝集》、《程仲權集》、《白豎山人集》、《靜觀堂集》、《楊道行集》、《許文穆集》、《朱太復集》、《珂雪齋集》、《荷華山房摘錄》；清翁方綱著述手稿 138 冊、清焦循《雕菰樓經學叢書》手稿 20 冊；敦煌經卷 27 種等。1948 年年底起，國立中央圖書館奉令精選珍貴圖書文物，包括抗戰時期在滬、港兩地購得的善本古籍，裝箱分批運臺；未幾，該館亦於臺北復館。館藏不能如數運臺，即就「香港購書目錄」上所著錄古籍文獻而言，若干種目前並未見該館館藏，除前文偶提及者外，再如李文田批校或收藏的《中亞洲俄屬抄記》（今中央研究院史語所藏有鈔本《中亞細亞俄羅斯屬游記》）、《江南鬧墨》、《法蘭西志》及《經濟文抄》等；敦煌經卷的六朝寫《佛名經》、六朝寫《大方等大集經》及唐寫《梵網經》（有序）三種，都是目前該館館藏所沒有的。這些書究竟是遺失在香港？抑或留在大陸？還是散佚在其他地方？尙待查考。至若在港購得書籍的保管事宜，根據國立中央圖書館大陸時期舊檔案中 1940 年 10 月 12 日葉恭綽致管理中

英庚款董事會函，得知「各書因時局及天氣關係，須另覓地存放，並加包裝，已先購兩鐵箱，寄存此間金城銀行（用「庚記」名義）」。

再說到在滬購得的古籍文獻，有關方面鑒於上海情勢愈漸緊急，且香港轉運似又較為方便，就決定先行運港再作打算，時約在 1941 年上半年。該年 7 月間，徐森玉在好友沈仲章協助下，租了一條荷蘭船，並疏通了上海海關，獲准不經檢查，即親自護著精選出來的 80 種最珍貴古籍，直接從上海登船前往香港。抵港後，隨即送航空公司運渝。因重慶連日遭遇空襲，以致滯留桂林，直至 9 月 10 日，國立中央圖書館與管理中庚庚款董事會的兩位代表始在重慶會同點清。<sup>[16]</sup>此外，又以郵包自滬寄出所購得古籍 2,000 多部，約 23,000 冊，包括剛成交不久的劉氏嘉業堂舊藏；全部經葉恭綽安排，寄放於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sup>[17]</sup>但因遠東局勢益形險惡，暫存在港的古籍仍得設法盡早運出。航空價昂，且未必可靠，最初想到的是經仰光陸運至昆明，由重慶方面遴派人員隨同照料赴瀘州，再運往白沙鄉下典藏。此一途徑須顧慮到仰光與昆明均貨積如山，得車非易，而西南運輸處辦事尤為遲緩，不如商辦，可是運商又一律觀望，因圖得運費，表面仍接受運貨，如輕率交運，結果恐仍滯留香港或仰光。後來，徐森玉與香港新綏公司接洽，可由香港海運至瀘州，每一公噸或 80 立方呎，需運費港幣 1,900 元，這不是筆小數目，再加上要 80 天才能抵達，未免耗費時日。總之，內運不易，且即使能夠運入，保存亦是一個問題。於是，最後決定請託駐美公使館與美國國會圖書館商議，代為保管，俟戰後運歸。<sup>[18]</sup>

### 三、馮平山圖書館暫存國立中央圖書館所購善本古籍的經過

1941 年 7 月間，在滬購得的古籍，由徐森玉先行隨身攜出最精品 80 種，抵港後再以空運至渝，其餘古籍則另以郵包寄出，經葉恭綽安排，暫時寄存於香港

<sup>[16]</sup> 運遷詳情及該 80 種最珍貴古籍的介紹，請參閱拙著〈記國立中央圖書館抗戰時期所蒐購淪陷區古籍最精品八十種〉一文，刊於即將出版的《慶祝喬衍琯教授七秩普五嵩壽論文集》。

<sup>[17]</sup> 同註 7，頁 234。國立中央圖書館大陸時期舊檔案中 1941 年 10 月 3 日蔣復璁呈部長密簽，提及當時存港善本有 3,000 餘種，約 30,000 冊（張氏適園藏書未計算在內），則是包括在港購得者。

<sup>[18]</sup> 以上參見國立中央圖書館大陸時期舊檔案中 1941 年 9 月 5 日該館致管理中庚庚款董事會函、同年 10 月 1 日管理中庚庚款董事會事務所致該館函，以及同年 10 月 3 日蔣復璁呈部長密簽。

大學馮平山圖書館，前文已提及。此等寄存的古籍，獲得港大中文學院許地山主任和馬鑑教授幫忙，派人協助保管。在教育部和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還沒有決定是內運或運美寄存之前，整理裝箱是當務之急。這項工作，葉恭綽僅任指揮，凡對外接洽及打包、過秤等事，都由徐森玉來辦<sup>[19]</sup>；徐森玉還曾將各郵包排比號碼，發現重出者、短缺者數處，頗覺束手無策，並提到各書原係鄭振鐸一手經理，若鄭氏能到港，則可謂事半功倍。<sup>[20]</sup>裝書的木箱，內襯鉛皮，外圍鐵帶，是託王雲五代製的，而工作人員分成兩組，葉恭綽的族妹和堂弟為一組，陳垣的長媳及一位郭君為另一組，分別將上海寄到的郵包拆封、核對、登錄，再裝箱。在馮平山圖書館陳君葆主任協助照料下，忙了一個半月，共裝 111 箱。<sup>[21]</sup>10 月初，終於決定要將在滬、港兩地購得的善本書運美，請美國國會圖書館代為保管。<sup>[22]</sup>接下來，即為將來辨識方便起見，必須在即將運美的每冊書上趕緊加蓋「國立中 / 央圖書 / 館收藏」朱文方印（見書影四與書影五）及「管理中英庚 / 款董事會保 / 存文獻之章」朱文長方印（見書影六），工作人員只好打開裝畢的木箱，全部從頭做起。<sup>[23]</sup>11 月 26 日，葉恭綽致函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說連日趕辦，大概就緒，12 月初美船格蘭總統號可以運出云云<sup>[24]</sup>；至 12 月 4 日，又致函提及情勢緊張，格蘭總統號航程有變。<sup>[25]</sup>8 日，太平洋戰事終於爆發；25 日，香港淪陷，這一大批古籍的下落竟亦成謎。

翌年 8 月 8 日，在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事務所致蔣復璁函中提及兩條線索，一是「胡大使 6 月豔日來電，謂關於 GRANT 輪運庚款會古籍圖書，茲據美國總統輪船公司告以該輪已到美（自馬尼刺開出），……其最後一次行程未經香港，在馬尼刺時因急於駛行，亦未裝足貨物，後有一部份起卸於澳大利亞，趨

[19] 國立中央圖書館大陸時期舊檔案中 1941 年 7 月 28 日徐森玉致蔣復璁函。

[20] 國立中央圖書館大陸時期舊檔案中 1941 年 8 月 19 日徐森玉致蔣復璁函。

[21] 同註 7，頁 234。

[22] 國立中央圖書館大陸時期舊檔案中藏有 1941 年 9 月中蔣復璁呈部長密簽的草稿及謄清稿，都只提到書籍內運，但謄清稿上又經修正，日期並改為 10 月 3 日，則已刪卻「內運」文字，而增入「運美」的說明。

[23] 同註 7，頁 234。

[24] 國立中央圖書館大陸時期舊檔案中 1942 年 2 月 6 日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事務所致該館函。

[25] 國立中央圖書館大陸時期舊檔案中 1942 年 8 月 8 日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事務所致蔣復璁函。

向除再飭詳查外，尊處如有消息，乞電示，至感云云。即於 7 月 16 日復以葉（恭綽）末次函云，古籍本定裝格蘭，不料情勢緊，航運變，接洽無結果，似未裝出等語」；一是「最近陳寅恪先生脫離香港，到達桂林，於 6 月 20 日來書謂英庚款會所購善本書多為日本『波部隊』運至東京，其運去之書日無意中發現，今存於馬季明（即馬鑑）先生處，將來勝利之後，可以按目索還，或索賠損失云云」。至於詳細經過，則直至勝利後才清楚。

原來這寄存於馮平山圖書館的 111 箱善本書，因變起倉卒而中止運美，仍留在該館裡。香港淪陷後三日，即 1941 年 12 月 28 日，日軍官七、八名，由日商人竹藤峰治及何通譯嚮導，至館巡視；30 日，在門外釘「大日本軍民政部管理」木條。後，日軍仔細檢查館內藏書時，發現了這 111 箱善本書，木箱上寫著收件人是「華盛頓中國駐美大使胡適博士」，而寄件人是「中英文化協會香港分會秘書陳君葆」。1942 年 1 月 9 日，陳君葆主任與館員劉國綦、館役劉弼往見憲兵隊長平川。平川問因何有一批中國古籍要運往美國，陳君葆妙為解答，始免於禍。<sup>[26]</sup>又在 1 月中，陳君葆曾數與日方圖書蒐集專員宮本博少佐（軍調班長）、須山卓等交涉，擬將這批古籍留作專門研究參考用，當時得到的答覆是「須向東京請示，始能決定」。2 月初，陳君葆被告知，說須全部運日。2 月 6 日左右，竹藤峰治帶引調查班宮本博少佐及肥田木近中尉，由日波字第 8111 部隊將這批古籍強行運走，木箱上改寫成寄「東京參謀本部一極秘」。其實，來自上海的寄存古籍尚有兩皮箱，計 520 餘冊，託李寶棠先生帶至香港，因未見蓋有國立中央圖書館印記，日軍即當作是皮箱外所寫的「李寶棠」寄存在馮平山圖書館內

<sup>[26]</sup> 劉國綦，〈服務馮平山圖書館的回憶—為該館成立二十五週年銀禧紀念而作（五）〉，《華僑日報》（香港），1957.12.19，第 3 張第 4 頁；又，小思，〈一段護書往事—記陳君葆先生〉，謝榮滾主編《陳君葆日記》（香港：商務印書館，1999.4），頁 1131-1136。此外，黎樹添〈馮平山圖書館簡史〉（刊於 1982 年該館出版的《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金禧紀念論文集》，頁 16-30）中亦提及此事：1941 年「12 月 28 日，日軍官七、八人由日本商人竹藤峰治及通譯嚮導，到館（按：指馮平山圖書館）巡視。兩天後，日兵來館釘上『大日本軍民政部管理』木條在館外。次日又加釘『大日本陸軍管理第五號』木條。兩天後，日軍又派人到館釘封各室，外加『立入嚴禁，軍蒐集第四班』封條。陳君葆先生及劉國綦先生在 1 月 9 日往見平川憲兵隊長。平川著令書寫本館簡史，由通譯翻為日文。陳先生等候至深夜始被傳進飲食室，在席間又受平川的審問。尤其是關於中央圖書館寄存待運美國的書籍，責難陳先生等以東方文化資敵。幸陳先生等巧為解答，始免於禍。……當晚，各人被扣留一宵。翌日由平川帶同各人往訪大學校長史樂詩教授（Dr. D. Sloss），查詢該批書籍情形，又往各人住宅搜查後，始獲釋放。」查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陳君葆日記》本文，並無上述有關記載。



者，所以未被運走而保留下來。<sup>[27]</sup>

直到勝利前，關於被日本「波部隊」所劫走古籍的下落，僅有如上述胡適和陳寅恪等提供的少許線索。抗戰勝利後，從 1945 年底至 1946 年初，我國教育部、外交部、軍令部等單位，在港、臺、日三地展開追查。<sup>[28]</sup> 陳君葆於 1946 年 2 月 16 日致函教育部次長杭立武，說曾與香港的英海軍情報當局兩次提審被拘留在香港日俘集中營的竹藤峰治（宮本博及肥田木近二人則已離港），但他堅不吐實。<sup>[29]</sup> 又蔣復璁奉教育部訓令，根據所轉北平圖書館館長袁同禮報告，這批善本有因為日軍船隻故障而停靠在臺北的說法，即於 2 月間致函臺灣行政長官公署，請協助追查。<sup>[30]</sup> 不久，有人在東京上野公園帝國圖書館中看到所藏《永樂大典》上鈐有國立中央圖書館的印記，繼而又在其他書上發現除上述印記外，還有劉氏嘉業堂藏書印。<sup>[31]</sup> 從 3 月 14 日軍事委員會軍令部派駐東京聯絡參謀王之，唐啓琨電得知，經交涉結果，日方已允歸還，俟目錄編竣，即交我上海教育局長顧毓琇及外交部劉專員等設法接收運回。<sup>[32]</sup> 又，外交部駐日盟軍最高統帥

<sup>[27]</sup> 以上參見馮平山圖書館所藏 1945 年 11 月 19 日陳君葆致蔣復璁函。又，國立中央圖書館大陸時期舊檔案中 1946 年 1 月 31 日教育部訓令（淪社字第 6620 號）轉北平圖書館館長袁同禮報告，木箱上日人所改寫字樣為「東京參謀本部御中」；原文為：「案據國立北平圖書館館長袁同禮報告略稱：『太平洋事變以前，中央圖書館寄存於香港馮平山圖書館善本書壹百貳拾餘箱，原擬運美暫存，以變起倉卒而中止。三十年二月間，由日人竹藤峰治帶引日軍調查班宮本博少佐及肥田木近中尉，將此批善本書強行劫取，每箱上寫「東京參謀本部御中」字樣，當時以為全部藏書均以運往東京。前函香港友人詳加調查，近接復函，內稱：日軍運輸困難，該書籍或被運至臺灣而中止。茲為追查其下落起見，（此下若干字不清晰）及外交部駐日連絡員在臺北及東京分別追查，以便日後提取。又此案之主要人物宮本博及肥田木近已不在港，惟竹藤峰治現被拘留於香港日俘集中營，擬請逕函外交部轉請香港軍政府，迅將該犯提訊，並取據口供，以期明瞭此批書之現存地點』等情；除分別函令辦理外，合行令仰該館知照。此令，部長朱家驊。」

<sup>[28]</sup> 同註 7，頁 234-235。

<sup>[29]</sup> 原函現藏港大馮平山圖書館。又參見註 27 袁同禮報告。

<sup>[30]</sup> 函稿見國立中央圖書館大陸時期舊檔案中。

<sup>[31]</sup> 同註 7，頁 235。

<sup>[32]</sup> 見國立中央圖書館大陸時期舊檔案中 1946 年 3 月 27 日教育部給中央圖書館的訓令，准軍事委員會軍令部代電。原文為：「案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軍令部（三五）寅巧令二宮代電內開：『據本部駐東京聯絡參謀王之，唐啓琨三月十四日電稱：日本前在香港搶奪我國中央圖書館書籍壹百參拾箱，計參萬餘冊，存於帝國館內，經交涉結果，已允歸還。目錄編竣，即交我上海教育局長顧毓琇及外交部劉專員等設法接收運回等情，特電查照』等由。准此，除電復外，合亟令仰知照。此令。部長朱家驊。」又萬國雄《顧毓琇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

部聯絡參謀辦事處專員劉增華電稱，被日人竹藤峰治等劫走的善本書，「在上野公園帝國圖書館查得該館所保管者約 25,000 冊，因空襲疏散在伊勢原者約 10,000 冊，業經該館司書官岡田溫立有承認字據，惟所裝木箱均被啓封。……俟點收後，約 1 月內可設法運出」。<sup>[33]</sup> 原來這批古籍被劫往東京後，輾轉交給帝國圖書館，並由該館委託版本目錄學者長澤規矩也整理，戰後，選出較珍貴的部分，送到伊勢原鄉下一位村長家的土窖中藏匿，以避免為美軍所接收。<sup>[34]</sup> 後來，經隨聯合國日本管制委員會中國代表團赴東京的張鳳舉交涉兩月，先取 10 箱，計 183 部，2,550 冊，運返。<sup>[35]</sup> 其餘在 8 月 18 日交還，包括前已運返者共 3,286 部，34,970 冊。翌年 2 月全數安抵南京國立中央圖書館。<sup>[36]</sup>

對於這批古籍的下落，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主任陳君葆始終相當關注，並協助查訪。如前面提及 1946 年 2 月所致教育部次長杭立武函，除告知提審日人竹藤峰治的情形外，函末還表示「若尊意以為此事仍須交由弟繼續負責辦理，最好請正式加以代表或任何其他適當名義，俾便進行。」<sup>[37]</sup> 又如他曾託外國友人博薩爾隨遠東委員會到日本調查戰爭罪行時，代為留意失蹤古籍的下落，6 月 16 日從博薩爾信中得知博薩爾在帝國圖書館發現自香港移來的這批善本書，就在他的日記中寫著：「博是正月十號隨遠東委會到日本，二月一號再返美，發現書籍約在一月中至廿日的期間」，並隨即致函杭立武，請加速追查失書。<sup>[38]</sup> 可見他對此事的熱心，而又有所貢獻。

雖然被劫往東京的 111 箱善本書總算運返國土，但寄存香港的其他古籍，包

---

社，2001.12) 述及 1946 年顧毓琇受麥克阿瑟元帥總部之邀，訪問日本，「在參觀東京帝國圖書館時，無意中發現劫去的我國中央圖書館的善本書若干箱，尚未打開；他當即面告帝國圖書館負責人，最好自動運回中國，免得他報告麥帥總部後被動送走。這批善本書不久全部運回中國，受到中央圖書館館長蔣復璁的表揚。蔣復璁八十年代在臺灣北報紙上，還為文回述了當年善本書運回的經過，對顧毓琇的功績，念念不忘。」(見該書頁 146)

<sup>[33]</sup> 國立中央圖書館大陸時期舊檔案中教育部給中央圖書館的訓令，渝三十五總收字第 148 號，准外交部 1946 年 3 月 28 日歐字第 4498 號代電。

<sup>[34]</sup> 同註 7，頁 235。

<sup>[35]</sup> 國立中央圖書館大陸時期舊檔案中 1946 年 6 月 5 日張鳳舉致蔣復璁函。

<sup>[36]</sup> 同註 7，頁 235。又，故宮博物院古物館科長王世襄當年曾隨代表團赴日交涉被劫文物，後並乘船將所餘下百餘箱中央圖書館的善本書護送回國，見王世襄，〈回憶抗戰勝利後平津地區文物清理工作〉，《王世襄自選集—錦灰堆》(北京：三聯，1999.8)，頁 558-563。

<sup>[37]</sup> 同註 29。

<sup>[38]</sup> 同註 26，《陳君葆日記》，頁 882-883，以及該書書末小思一文，頁 1133-1134。

括淪陷前來不及裝箱的書、李寶棠從上海帶到香港的書、以及擬由港寄滬而未曾寄出的書，在戰後卻有不少成爲下落不明。國立中央圖書館大陸時期舊檔案裡保存 1946 年 4 月 16 日抄錄，後並經校補的該館在香港所遺失善本圖書目錄，茲附於文末，備作參考。

#### 四、後語

國立中央圖書館已易名國家圖書館，自籌備處成立迄今滿七十載，馮平山圖書館亦剛過七十周年館慶，兩館在抗戰期間對我國善本古籍的搶救又均作出相當貢獻，謹以拙文聊表祝賀的心意，同時更寄望未來古籍整理工作順利開展，贏得輝煌成果，不致辜負前輩昔日的辛勤付出。此外，拙文得以撰就，特別感謝兩館朋友、同事們熱心提供寶貴資料；專家著述多所啓發，都讓筆者獲益匪淺。舊檔案資料尚多未經整理，進一步的研究成果有待志同道合者共同努力。

## 附 錄

## 國立中央圖書館在香港遺失之善本圖書目錄

本日所列皆迄今為止，尚未發現之書。凡曩年寄存香港之書，今日已在日本及香港發現者，此目概不列入。卅五年四月十六日抄

## 一、香港未裝箱書目（甲）

曩年由滬寄港，擬轉運美國之書，共裝一百一十一箱（連港購書在內），尚有未及裝箱者，此目中所列是也（一百一十一箱之書已在日本發現，故此目不列）。

- |                           |                            |
|---------------------------|----------------------------|
| 《陪古陪詩》（疑有誤字）五冊            | 《王御史江西疏稿》六冊                |
| 《徙倚軒詩集》一冊 <sup>[39]</sup> | 《寶顏堂秘笈續集》五十冊               |
| 明抄《處置套虜奏議》四冊              | 《北獄廟集》十二冊                  |
| 《四夷館考》一冊                  | 《豔異編》十四冊                   |
| 《禦倭行軍條例》一冊                | 《袖珍方大全》十二冊 <sup>[40]</sup> |
| 《四聲猿》二冊                   | 宋刊《通鑑綱目》二冊                 |
| 《醫學綱目》四十一冊（校：已在日本發現。）     |                            |
| 《萬首唐人絕句》二十冊（校：已在日本發現。）    |                            |
| 弘治十八年登錄三冊（校：已在日本發現。）      |                            |

## 二、香港未裝箱書目（乙）

以下所列皆葉玉甫（即葉恭綽）先生經手在香港所購之書，而未及裝入一百一十一箱中者。

（校：此項佛經，除六朝寫《佛名經》、《大方等大集經》、及唐寫《梵網經》三種為葉氏遺失外，其餘均已於三十六年一月四日交還。）

六朝寫《佛名經》一卷 唐寫《法華經》第十四、五品一卷

六朝寫《大方等大集經》一卷 唐寫《密嚴經》一卷

六朝寫經一卷 唐寫《法華經》化城喻品一卷

唐寫《無量壽宗要經》一卷 唐寫《涅槃經》化城喻品（疑有誤）一卷 / 有軸

<sup>[39]</sup> 該館現藏，書號 11958 者，鈐有「國立中 / 央圖書 / 館收藏」朱文方印，疑即此。

<sup>[40]</sup> 該館現藏《魁本袖珍方大全》四卷，明弘治十八年集賢書堂刊本，書號為 06180，鈐有「國立中 / 央圖書 / 館收藏」朱文方印，疑即此。

唐寫《梵網經》有序一卷 唐寫《大灌頂經》一卷  
 唐寫《法華經》第三、四品一卷 唐寫《大涅槃經》第五卷一卷 / 有軸  
 唐寫《大智度論》第六十二、三卷一卷 唐寫《金剛經》殘卷一卷  
 唐寫《大般若經》第二百零七卷一卷 唐寫道教經殘卷一卷  
 唐寫《無量壽宗經》 / 孟郎子寫 / 三卷 《咒魅神（原誤作「神魅」）經》  
 一卷  
 唐寫《法華經》方便品一卷 《新菩薩經》一卷  
 唐寫《金剛經》一卷 殘經二卷  
 唐寫《金光明經》吉祥天女品一卷 雜疏文一卷  
 《無量壽佛經》一卷 《華嚴經》第三十一卷一卷  
 唐寫《大般若經》第二百三十一卷一卷

以上佛經二十七種係擬由香港寄重慶而未及寄出者。

《建文朝野類編》八冊

此一種係擬寄重慶而未及寄出者。

《風角書》 / 葉氏平安館抄本 / 二冊 《竹友軒詩》 / 孔氏抄本 / 二冊

《經濟文鈔》四冊

以上三種係未裝箱者。

### 三、李寶棠先由滬帶港圖書目錄

李寶棠先生由滬帶港之書共計五十一種，除由馬季明（即馬鑑）先生帶往重慶，交付本館之（1）《甲申紀事》四冊、（2）《虞齋考工記解》四冊、（3）《老學庵筆記》三冊、（4）《鹿門詩集》一冊，共計四種（據港訊：當時馬季明先生由港帶入內地者計八種，本館收到者祇四種）外，尚餘四十七種，前承陳君葆先生函示，謂已發現十九種，且抄示目錄，是尚有二十八種下落不明，此下所列，即該二十八種之目錄也。<sup>[41]</sup>

<sup>[41]</sup> 國立中央圖書館大陸時期舊檔案中保存有教育部清理戰時文物損失委員會港粵區代表簡又文所呈報該會報告書（1946年3月28日寄自廣州）的節錄本，其中提及交馬季明（鑑）帶入內地的8種書，聞途中有損失者，確數未知。又據舊檔案中1946年3月10日蔣復璁致馬鑑函的函稿，稱李寶棠帶至香港的51種圖書，原擬提出一部份航空運渝，旋以香港變生倉猝，未能辦成，下落不明的20餘種或係由於此原故，所以與日前發現的19種不在一處云云，可供參考。陳君葆函稱已發現的19種，為：1.《左傳附釋》（明初刊本）、2.《重訂四書輯釋》（明初刊本）、3.《文獻通考》（明刊本）、4.《皇朝編年舉要備要》（陳均輯，鈔本）、5.《諸

- 《安南來威圖》三卷《安南輯(原誤作「韓」)略》三卷/明隆慶刊本/六冊  
 《遼籌》不分卷/明刊本/二冊 《裔乘》八卷/明萬曆刊本/六冊  
 《紀古滇說集》一卷/嘉靖刊本/一冊《交黎剿平事略》四卷/全上/六冊  
 《東夷考略》附《東夷事答問》不分卷/明刊本/三冊  
 《邊政考》十二卷/嘉靖刊本/六冊 《萬曆三大征考》不分卷/明刊本/  
 一冊  
 《九邊圖說》不分卷/明刊本/二冊 《張說之集》八卷/明活字本/一冊  
 《宣大山西三鎮圖說》三卷/明刊本/三冊  
 《唐僧弘秀集》十卷/萬曆刊本/四冊  
 《宗元先生集》二卷/明抄本,錢曾校/一冊  
 《後村居士集》存三卷/宋刊本/二冊  
 《金(原誤作「全」)荃集》七卷/汲古閣本,陳帆校/一冊  
 《皇明印史》四卷/天啓刊本/四冊 《孟東野詩集》十卷/弘治刊本/四冊  
 《古文苑》九卷/明刊本/八冊 《孟襄陽詩集》三卷/汲古閣本/一冊  
 《惠山集》六卷/弘治刊本/二冊 《宋之問集》二卷/崦西精舍本/一冊  
 《石湖志》六卷/弘治刊本/二冊  
 《皇甫冉集》二(疑作「三」)卷《皇甫曾集》二卷/明活字本/一冊  
 《韓詩外傳》十卷/通津草堂本/五冊 《岳陽古集》一卷/萬曆刊本/一冊  
 劉向《說苑》二十卷/明刊黑口本/四冊  
 《戴叔(原誤作「林」)倫集》二卷/明活字本/一冊  
 《新序》十卷/明刊黑口本/二冊

#### 四、擬由港寄渝未曾寄出之圖書

曩年由葉玉甫先生在港選出圖書若干種,擬郵寄重慶,但未及寄出,香港遽

---

司職掌》(明初刊本)、6.《子苑》(手鈔本)、7.《清閣全集》(姚希孟撰)、8.《梅溪先生集》(王十朋撰,明正統刊本)、9.《七十二家》(張燮纂,明刊本)、10.《文山先生文集》(明景泰刊本)、11.《滕王閣集》(余奚容輯)、12.《古今事文類聚》(祝穆編)、13.《錦繡萬花谷集》(繡石書堂刊本)、14.《海錄碎事》(明萬曆刊本)、15.《桂勝》(附《桂故》,張鳴鳳撰)、16.《銀海精微》(鈔本)、17.《天元玉曆祥異賦》(鈔本)、18.《行軍六壬指南》、19.《小兒衛生總微論》:試查臺北該館現藏,多未見。至若下落不明的28種,其中如《安南來威圖》、《遼籌》、《裔乘》、《紀古滇說集》、《交黎剿平事略》、《東夷考略》、《九邊圖說》、《宣大山西三鎮圖說》等,前已輯入《玄覽堂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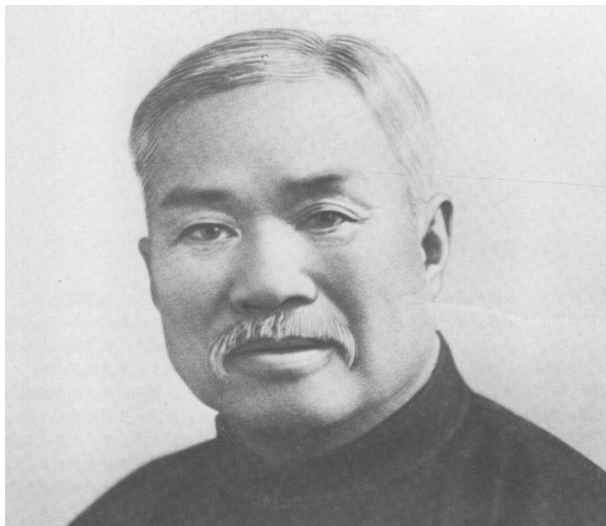
爾淪陷，此一批書已由簡又文先生在香港東亞銀行倉庫中發現，並經清點後有目錄報部。茲以簡又文先生報部之目，與葉玉甫先生當年由港寄渝之目相校，則尚有兩種未被發現<sup>[42]</sup>，其書如下列：

《李氏焚餘》五冊 《勦闖小說》一冊  
 (校：此二種已由葉玉甫先生交來。)

卅五、十一、二十七日校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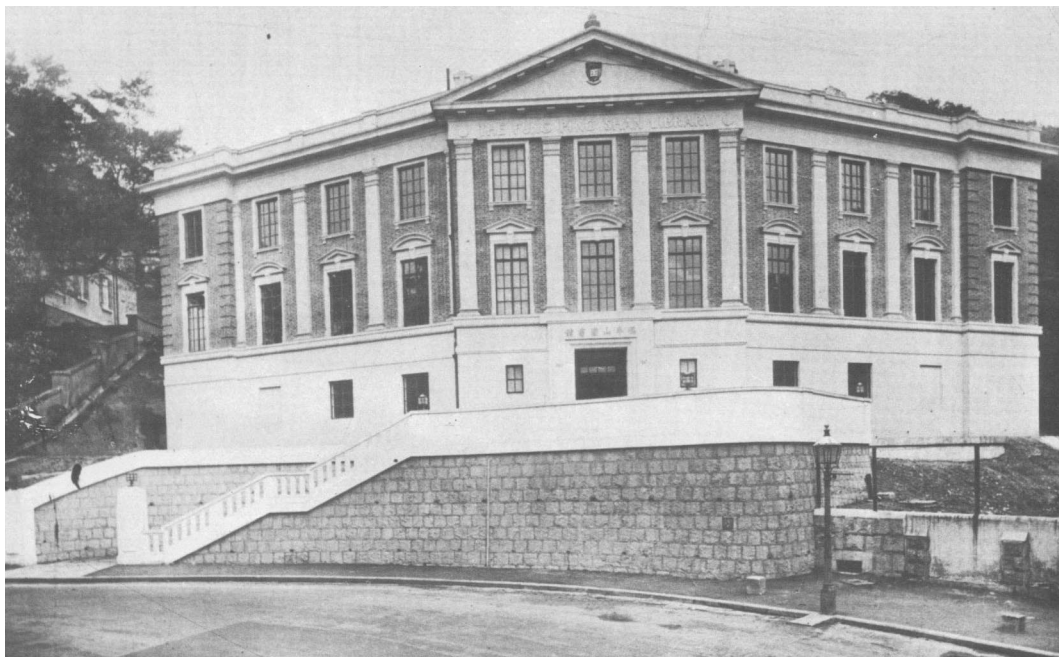
<sup>[42]</sup> 國立中央圖書館大陸時期舊檔案中保存有 1946 年 5 月 13 日葉恭綽致蔣復璁函，提及「前此執事開單，擬提出寄淪之書（三十年十一月底事），當時經馬季明先生檢出，由弟包封，擬交空郵，後以航空公司可以帶淪，遂改託其帶寄。不料延未運出，且放置該公司過道，弟恐其弄壞，遂先取存陸佑行英庚會辦事處，候有一定運期，再交與該公司，不料數日間戰事遂起。逮香港淪陷，弟覓人冒險往探，則已並其他文件一併失去。旋探知為人移存他處，經給賞，取回弟九龍寓內。嗣歷數月，有人入內地，因託其密運，至廣九灣，從此遂無消息，弟以為失去矣。勝利後，經手人來，云該件因廣州灣受阻，遂仍運回港，幸未失去，仍存東亞銀行。弟因告知杭立武先生設法取出，其中又經許多周折，始由簡又文手取。」敘述此事原委頗詳。今查國立中央圖書館大陸時期舊檔案中保存有 1941 年 12 月擬由香港航空運淪圖書目錄及該館在香港東亞銀行存書（兩箱）目錄兩種；前者多出敦煌寫經 27 種（即列入「中央圖書館在香港遺失之善本圖書目錄」中「二、香港未裝箱書目（乙）」者），以及《李氏焚餘》、《勦闖小說》二書；後者則多出若干襯箱用的普通古籍。後來，除敦煌寫經 3 種遺失外，所缺經卷及圖書已由葉恭綽交回。不過，這兩種目錄上的書，卻有不見於臺北該館現藏者，如《全唐詩稿》158 冊，應係文獻保存同志會第二號工作報告書中所提到的謄清本，不同於先由徐森玉攜出，列入最精品 80 種之一，而現藏臺北該館的清初錢謙益與季振宜二氏遞輯底稿本。

## 圖 錄



圖一：馮平山先生像

資料來源：馮平山圖書館金禧紀念論文集編輯委員會，《馮平山圖書館金禧紀念論文集（1932-1982）》（香港：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1982）



圖二：馮平山圖書館全貌（1932年）

資料來源：同上圖，頁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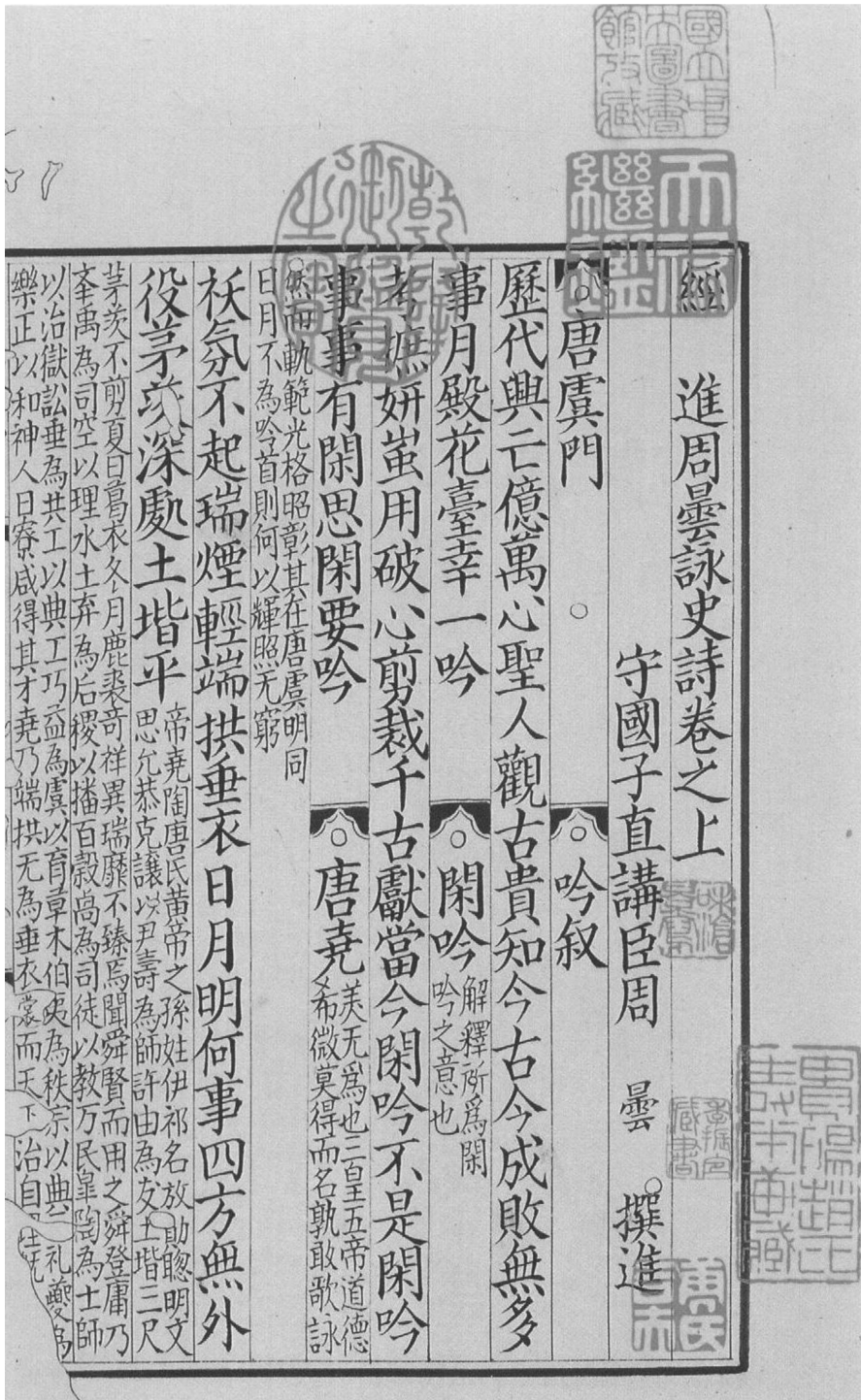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一

嘉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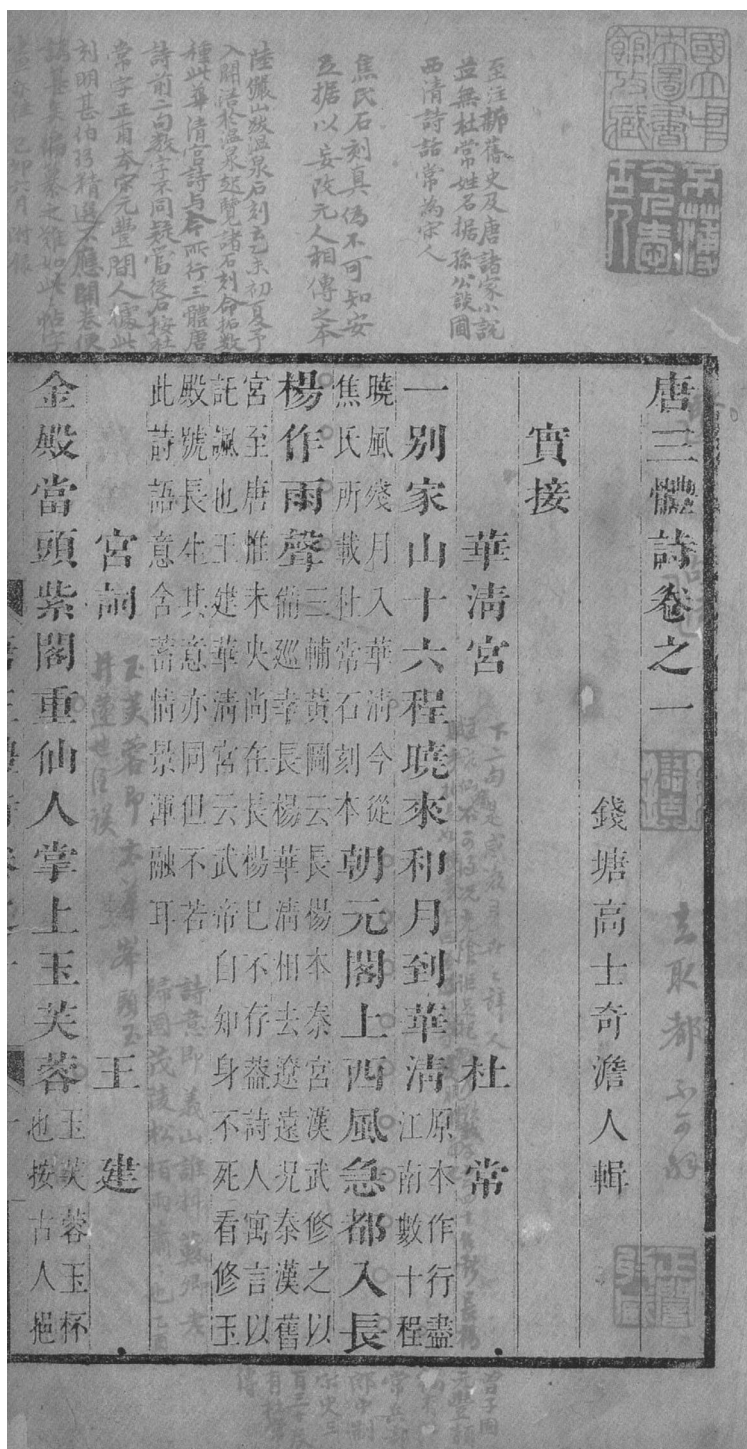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以德遺後者昌。以禍遺後者亡。謙柔卑退者德之餘。強忍姦詐者禍之始。○貞良而亡。先人餘殃。猖獗而活。先人餘烈。○貴賤無常。唯人所速。苟善則庸夫之子可至於三公。不善則王公之子反為庶人。○樂只君子。保艾爾後。○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祿天祿。子孫賴之。○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未嘗不昌。○惟德不忘。延世承寵。○盛德必百世祀。○器博者無近用。道長者其功遠。○修成淋德。施及子孫。○但能顯立功效。自然福及後昆。○德在人者。死必奉其嗣。○興社稷之利。除萬人之害。則福祿流於無窮。功烈著於不滅。○毋貪不可異。則福祿流於子孫。○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良臣使身獲美名。君受顯號。子孫傳業。福祿無疆。○樹至德於生前。流遺愛於身後。○功存于人。澤垂于後。○仁之所積者厚。故澤之所流者深。○功既存于社稷。慶宜及於子孫。○積善存仁。必

書影三：《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乃內閣大庫舊物，為早期館藏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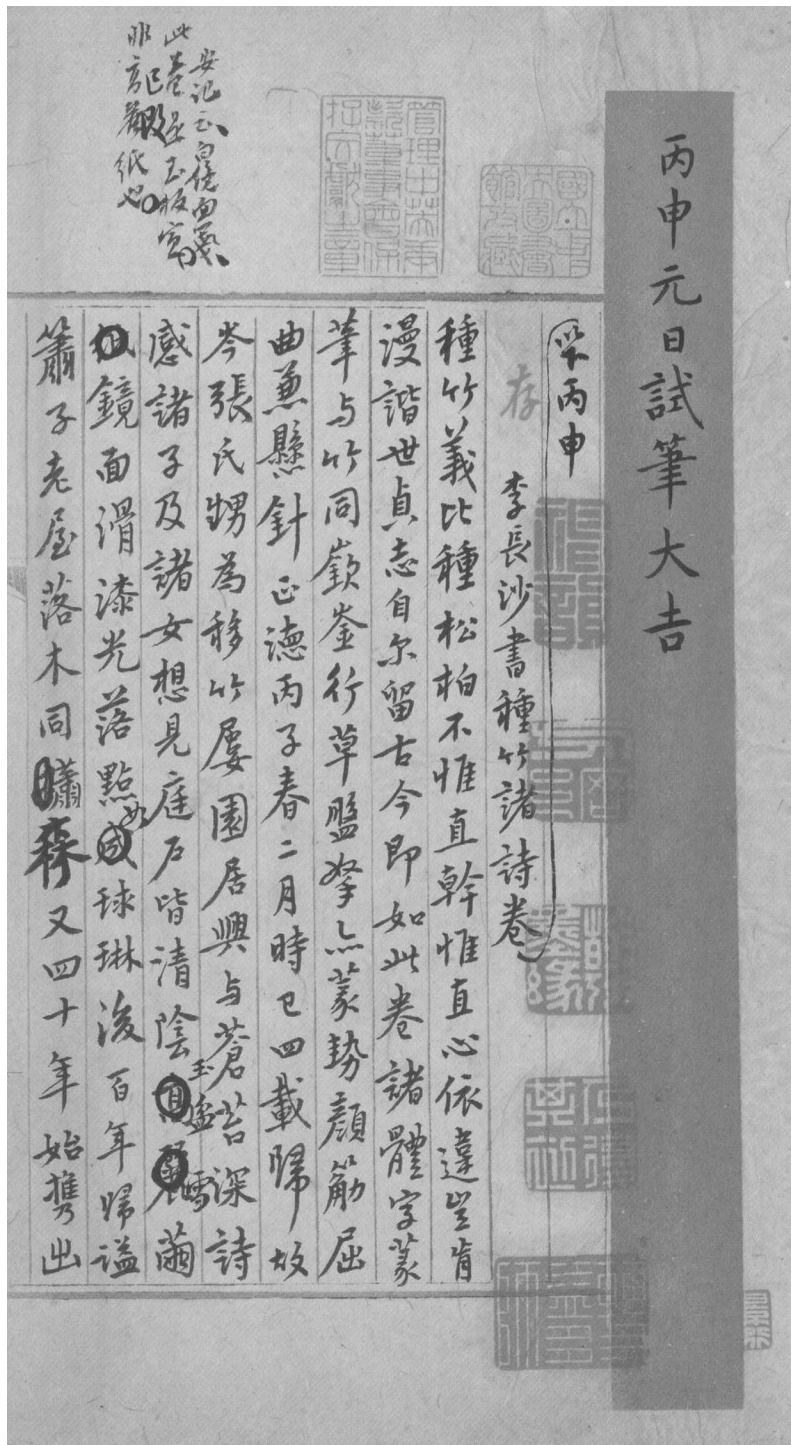


書影四：《經進周曇詠史詩》明清藏書家珍重宋元版。鈐有「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朱文方印



書影五：《唐三體詩》清康熙間錢塘高氏刊本。鈐有「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朱文方印



書影六：《復初齋全集》清乾嘉間翁方綱手稿本。鈐有「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朱文方印及「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保存文獻之章」朱文長方印

# The Roles of Hong Kong and Fung Ping Shan Library in Saving China's Rare Books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Chin-tang Lu

## Abstract

In order to preserve the materials of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NCL) and shed light on traditional academic culture, from the outset of its creation the NCL has placed high priority on collecting rare books. By forming a network of like-minded scholars in Shanghai and Hong Kong during the War, the scale and significance of its acquisitions reached an outstanding level. With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eople, in the end many rare works were saved from being exported to a foreign country. Being one of the most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collecting precious works of the 19th century, much scholarship has been written on this feat. However, as most focus on the so-called "Comrades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Literature" in Shanghai, they tend to overlook the role that Hong Kong played in

---

**Keywords (關鍵詞)** :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Fung Ping Shan Library; Ancient Book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國立中央圖書館；馮平山圖書館；古籍；抗戰時期

Chin-tang Lu : Director, Materials Divisio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Taipei, R.O.C. : E-mail: lkt@msg.ncl.edu.tw

gathering and transferring the works to Shanghai, especially the Fung Ping Shan Library's provisional storing of the works. While also referring to such previous works, this article was based on the archives of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when it was situated in the mainland. It would be appreciated if local historians would contact the author to submit their comments and insights.